

# 我要上大學 -----從工農兵到美國大學教授

余岐青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終身教授

中國中山大學客座教授

通訊地址: Professor Qiqing Yu,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NY 13902, USA (美國)  
email: qyu@math.binghamton.edu  
http://math.binghamton.edu/qyu

## 引言

每個人在童年的時候，都會有許多美麗的夢想。這些夢想曾經給我們帶來快樂和憧憬，同時設定了人生的目標，對我們一生起了重要的影響。

人到中年，尤其是過了知天命之年，真是往事如湮。年復一年，我看著一批批的新生走進大學的校園，興高彩烈地開始他們的大學生生活。每當此時，我常常會情不自禁地想起我那康樂園內的青春年華，以及那崎嶇漫長的爭取上大學之路。從我第一次萌發作一名大學生的願望，到我最後圓了我的大學夢，一共用了十六年。在這十六年中，我曾兩次以註冊旁聽生的身份利用業餘時間坐在大學的課堂裡。當我最終成為一名正式的大學生時，我無法忘記自己是多麼地欣喜若狂。要知道，在此之前，我們這一代68年的知青，和絕大多數的同齡人一起，已離開中學整整十年了。在那十年中，無論是在農村的層層梯田間，還是在部隊的海島邊防上，或者是在工廠的寬敞車間裡，我會常常想起高玉寶的故事，我會常常想朝天高聲大喊：“我要上大學。”

## 童年

聽父親說，我的曾祖父余維翰是江西省宜黃縣邊遠山區的梨溪鄉裡歷史上唯一中榜的秀才。祖父余道賢是梨溪鄉的中醫。外祖父徐長庚高等師專畢業，曾是宜黃縣唯一的一所中學的老師。母親徐惠霞也曾在那所中學當過老師。外祖母陳夢景當過小學老師。父親余潛九則是梨溪鄉歷史上第一個大學生。1944年考取中山大學醫學院。父親學醫是因為那時醫學院和師範學院是公費的。因為經濟條件所限，父親自己一個人挑著行李風餐露宿，步行幾百公里走出山溝上大學。在我小的時候，父親就想把我培養成醫生。記得八歲那年的冬天，母親為我買了一件西裝大衣。我穿上後，父親笑著對我說：“你現在像個大學生了。”我當時還小，並不懂大學生是什麼。我以為是指我像“大的”學生呢。嚴厲的父親在我六歲時開始教我學俄語，那時我還沒開始學語文。九歲那年，父親開始教我學英語。以後天天督促我跟著廣州廣播電視大學的廣播教學進度上課。過了兩年，父親張羅著讓我正式註冊跟班學習。

1962年至1966年我正式註冊以旁聽生的身份用業餘時間在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習英語和俄語。畢業生具有相當於四年大學本科生的公共外語水平。當時電大要求每個學生年滿十八歲。我是唯一的小學生，申請報名時還頗費週折。父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說服了電大有關人員為我破例。結果電大方面提出：要我所在的寺貝通津

小學給我出具證明，證明該小學同意我申請；然後電大才讓我註冊，但是是以旁聽生的資格錄取。就是說，畢業後沒有文憑。儘管如此，我父親還是奔波於市中心的電大和東山區的寺貝通津小學之間。幸好寺貝通津小學的老師和校長，特別是蒙一農老師和仲寶蓮老師，為我的申請開了綠燈，證明我是該校最好的學生，使我順利被錄取。

電大的學生都是業餘時間參加學習的。上課是在早上六點到七點，中午12點半到一點半和下午五點半到六點半三段時間通過收音機進行。開始的時候，我的收音機是父親裝的礦石收音機。礦石收音機的缺點是抗震性能差。收聽廣播的時候，收音機經常會不響，要用手拍一拍，或用根針撥弄一下礦石，才能繼續收聽。後來父親又為我裝了一台晶體管收音機，它的接收效果大大改善，我再也不用拍收音機了。那時每週還有兩、三天在晚上八到九點的時候上電視課。那是在東山區工人文化宮上課的。文化宮的電視機是一台12吋的黑白電視機。上世紀60年代初，電視機可稀罕了。鮮有聽說誰家有台電視機的。週末我們坐公共汽車去解放中路的34中上課。電大在那裡租了課室，老師為我們解答問題，發放講義，收繳作業，測驗考試。電大英語用的是許國璋寫的課本，一共6冊。我們全部都學完了。那時書一本大概一元左右，學費好像一年10塊左右，大約一個工人四分之一的月工資。

在我開始電大課程的頭幾週，面對週圍的大人們，我簡直緊張警扭極了。他們都在20歲至40歲之間，而我才十一、二歲。時間長了，我才慢慢習慣了。尤其是當我看到我的考試測驗成績都是在80分以上時，我更加有了信心。我父母還為我保存至今一份當年的試卷。上面的分數是92分。在電大我嘗到了大學生活的滋味，同時建立了我能上大學的信心。那時我暗暗地下了決心“將來一定要上大學”。通過三年的學習，我修完了大學的英語課程，我記得結業考試分數在80分以上。作為旁聽生，儘管我的成績良好，按規定我沒有得到證書或文憑。但是它為我一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的俄語學到大學二年級程度，便被文化大革命中斷了。這是我第一次上大學。

1964年我考上了廣雅中學。她是當時廣州兩所最好的中學之一，另一所是華南師院附中。這兩所中學的升學率分別是百分之九十八和九十九。那時新生入學前，新生中的少先隊幹部都會被邀請參加夏令營。我記得全班45個同學在小學時都是少先隊幹部，其中有十幾個是大隊長、大隊委，二十幾個是中隊長、中隊委，剩下至少也是原來的小隊長。所以全班都參加了夏令營。頭一天營火晚會上，我們後來來的班長蔣葆根坐在我旁邊，他問我：“你長大了要做什麼？”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要上大學，當科學家。”我當時想，走進了廣雅中學，這所由清朝兩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名校，只要好好學習，自信不會是倒數第幾，上大學必然是順理成章的事。

蔣葆根問我也是有原因的。當時提倡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那個年代時髦的口號是“長大要當工農兵”。沒想到我後來真的應了這句口號。離開初中後，就沒能接著讀高中、上大學，反而先在山區做了兩年多地道的農民，爾後在海軍服役五年多，成為普通一兵，退伍後到廣東省拖拉機廠當了兩年多產業工人。整整十年，把工農兵全都當了一遍。

我有過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新中國社會秩序安全穩定，社會風氣催人上進。在小學和廣雅中學的時候，無憂無慮，沒有任何壓力。小學時學習成績是全級第一。那年參加廣州市小學生數學競賽，獲得三等獎。雖說在全市獲獎的一百餘人中只是倒數第十幾，好歹是全校唯一的獲獎者。第一次由蒙老師帶領我們班在東山區的兒童游泳池學游泳，我拳打腳踢地在水中掙扎著劃出十米，居然被兒童游泳池的教練看中，招進了他的游泳隊。從此比其他小學同學多了一點兒特權，每週都有三個下午可以在放學後參加游泳訓練。父親還為我買了一副小提琴，讓我在東山區少年之家學拉琴。練了幾次拉弓，我興味索然。父親見我似乎沒有音樂細胞，也就沒有再勉強我。在中學時雖然學習成績不是在全班名列前茅，但是也穩居上中。學習負擔不大。下午四點以後，所有學校功課都已做完。課餘時間學習電大的英語和俄語，仍然有時間踢足球、游泳。記得有一次上音樂課測驗唱歌，我那破鑼般的嗓子唱完後，薛老師當場給我100分。老師的話音剛落，全班哄堂大笑。因為薛老師剛剛才給夏紀美打了95分。她可是廣雅中學校歌詠隊的，有一副百靈鳥般的嗓子。儘管我的俄語學得比她多，俄語考試測驗還總是她第一、我第二。唱歌測驗居然反了過來。薛老師大概是要鼓勵我這一類缺乏唱歌天賦的學生。

## 農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就像一場惡夢，一代年輕學子被誤導在一場愚昧的政治鬥爭之中。兩年後，大多數的中學生下放到農村去當農民，或者叫知青(下鄉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們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同學留下來讀高中，留下來的大多是工農子女。我的名字叫岐青，拆開來念是山支青(山區支援邊疆青

年),大概是“名”中注定,要到山區當一回支青(支青與知青是近義詞),也因此一生都沒有機會再讀高中。1968年秋的一天,我知道將要下放到離廣州一百多公里的增城縣派潭公社的一個叫做馬二村的山村。那天,我騎單車繞進中山大學的校園,心裡暗自神傷。我當時以為這輩子大概再也沒有機會實現上大學的夢想了,因為所有的大學都關閉了。理由是青年人應由工人農民而不是由大學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教育。

毛主席當年的口號是：“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據說,根據他的號召,從1968年至1976年,數以千萬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當農民)。這項政策的後效應現在已經是有目共睹了。儘管當時我還很幼稚,下鄉的經歷卻使我強烈地感受到科學技術知識的重要性。沒有科學技術知識,既不能為自己創造美好的生活,為社會大有作為也只能是一句空話。作為一個只唸到初二的學生,我發現學的知識太少了。一個城裡的孩子,我既不懂農活,也不懂農業科學實驗所需要的物理化學知識。從小生長在城市知識分子家庭,到了農村之後,我才親身體會到什麼叫做工農差別,什麼叫做城鄉差別。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的月薪是一、二百元,普通工人的月薪是四、五十元,郊區富裕農村的農民一天掙一塊,而馬二村的農民一天才掙五、六毛。馬二村在派潭公社還算是富裕的了,鄰近有的村子一天才掙兩毛錢。工人有星期天休息,農民一年到頭都得勞動。當然這個差別比起當今中國的貧富差別要小得多,但是當時給我們的震動還是非常大的。它使我們認識了社會和中國的國情。

馬二村座落在一座名為復船崗的山腳下,因為這座山太像一條翻了的船。剛到那兒的時候,我和知青集體戶的其他兩個同學,韓穗生、梁春穗以及他的姐姐梁美端,花了兩三個鐘頭才爬到山頂。山頂上有當年國民政府軍隊抗擊日本鬼子的戰壕。一條小溪繞過村旁。聽說50年代中期,此處林蔭蔽日,村邊不遠處有一條瀑布,常年嘩嘩作響。公社化以後,農民勞動積極性未能充分發揮出來,加上人口急劇膨脹,農民生活變得緊巴巴的,環境每況愈下。當我們下鄉去馬二村的時候,半山腰下的樹林都被砍光了,村旁的瀑布只會在雨後才出現。真是應了一句老話“人窮、山光、水又盡”。下鄉的時候,馬二村的農民基本上有足夠的口糧,生活上自給自足。聽村裡的老人說,這比解放前好多了。但是村民們只有一點兒零花錢去買布,買醬油和鹽,以及一些勞動工具。除此之外就是奢望了。單車和手錶對農民來說是奢侈品,我們村裡只有一個人有手錶,因為他還是一個部隊復員的幹部。另外,正像毛主席當時多次關注的一樣,農村缺醫少藥。

父親是海軍一所軍醫學校的教師,我馬上意識到我可以改善村民的醫療條件方面有所作為。我把我的想法告訴父親,他很支持。正好他帶一班軍醫學員在423海軍醫院實習,就順便把我帶了去學習。在那兒,我學習打針、聽診、針灸、看病和識別中草藥。父親甚至帶我進手術室觀看動手術。一個月的學習後,我回到馬二村,帶回一套父親送給我的針灸器具、探熱針和聽診器,以及一套醫書,像人體解剖學、診斷學、赤腳醫生手冊、中草藥手冊和針灸手冊。我一邊繼續學習父親送的醫書,一邊用剛學的知識在我的休息時間為農民治病。

要不花錢為村民治病,主要靠針灸和中草藥。因為我是新手,我在自己身上練習針灸,有把握了才扎到農民身上。看病時,拿著醫書對照病情,然後告訴他們用什麼草藥,用多少,他們自會自己採集。下鄉的頭一年,有一次我也病了,得了黃疸性肝炎。我開始並未發現。我們公社有不少知青在那段時間得了這種病,他們都回廣州治病去了。細心的梁美端首先注意到我的臉和眼睛有黃疸的症狀。接著我也注意到黃疸的症狀漸漸出現在尿液裡。同學們勸我回廣州治病去。我當然也可以這樣做。但是我想,既然我在學醫,明知是這種病,又知道有什麼草藥治它,如果沒有信心自己給自己治病,我怎麼會有信心給村民們治病呢?於是按照醫書上的介紹,在田間地頭採集中草藥,像野菊花、半邊蓮,等等。回家洗乾淨,然後煮上一小時,將一碗水煮成半碗水,再喝下去。服藥以後,我自己覺得精神一直很好,症狀一天天減輕,自信心也一天天增強。因此我一天也沒有停止勞動。一個月後,我完全康復了。正巧母親來看我,我把這事告訴她。母親嚇了一跳。她是醫院的化驗師,連忙為我取了樣品回醫院化驗,証實沒事,才放心了。現在看來,是有點初生牛犢不畏虎,多少有點過於大膽無畏懼。

就這樣沒有誰指派任命,我自然而然地成了村裡的赤腳醫生,不過是完全不脫產的。村民們聽說我的父母都在廣州的大醫院裡工作,父親還是培養醫生的老師,非常相信我。當他們病了,他們會立刻找我去看病。有一次村裡有個叫作溫狗仔的小孩得了小兒麻痺症,雙腿完全軟癱,躺在床上一點也不能動彈。我每天放工後都去他家為他針灸治療,他父親去田野裡採集一種叫做火炭母的草藥為他搗碎了敷在腿上。經過一個多月的治療,他的大腿慢慢恢復了感覺,先是可以慢慢地活動,以後又可以下地走動,最後終於可以跑步、勞動了,儘管還是有點癩。消息傳開後,方圓幾哩外的農民都會來找我看病。但是我的醫療知識的確是很有限的,很多病我根本不會治。求知的願望重新喚醒埋在心上的上大學的夢想。

我這個赤腳醫生既沒有少幹一點生產隊裡的勞動,也沒有向村民要任何報酬。這是我自願的。但是村民們都記在心裡。農村幾乎每個月都有個民俗節日,大概是找個借口開葷。這些節日,村民們做糯米團,蒸米糕,都是放在竹葉上的。這時候,家家戶戶幾乎都會送幾葉給我們知青集體戶,因為我們四個知青都與村民們有著良好的關係。我們這個知青集體戶往往兩三天不用做飯,我們得迅速吃完,因為那時沒有冰箱。當然我們也很喜歡這些風味小吃。

農民那時叫作國家的主人,現在叫作弱勢群體。反正都一樣,農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雖然生活在最底層,

我在農村的生活仍然給我帶來快樂，帶來成就感，贏來村民的關愛和信任。人世間的關愛和幫助都是雙向的，相互的。下鄉期間，村民們給予我們的幫助和教育是說也說不完。下鄉伊始，家家戶戶的村民輪流給我們集體戶送上他們自己種的青菜。同時教我們在自己的自留地種菜。頭兩年，我們還未學會如何使青菜能保持接替時，村民總會在我們的菜園青黃不接的時候，主動給我們送菜（當然也沒有要錢）。剛下鄉時，我們可以說是五穀不分。挑起擔子，我一個十七歲、一米七六的小伙子，連一個十三、四歲的農村少女都比不過。直羞得我無地自容。農民對我們很寬容，耐心地教我們農業知識和農活。我們慢慢地學會了駛牛犁冬曬田、驅牛春耕耙田，播種、插秧、鋤草、施肥、灌溉、殺蟲、割稻、打禾、曬穀。我們還學會了種小麥、土豆、花生、甘蔗、煙葉；學會了破竹蔑編籬筐。農閑時農民們又帶我們上山採野藤，下河扎竹排，然後順著增江、珠江把竹排放到100公里以外的南海縣平洲鎮。上游水淺，一人放一個兩扎竹長一丈寬的小排，幾天後，放到了水深段，幾個排疊在一起，作成大排。一趟用一個月，在竹排上，看青山綠水，景色宜人。河流七彎八繞的，拐彎處往往是個很深的潭。人常說一彎一個景。遇到急流險灘，如果不能及時把排撐走，竹排就很可能會被急流沖散，功虧一簣。頭幾天，不懂行，在河流拐彎時，竹竿撐不到河底，幾次連人帶竹竿一起栽進深潭裡。游回來，爬上竹排，大伙哄笑一場後，農民們向我們一再介紹要領。以後的日子，到了急流險灘，手中長杆準確用力地一撐，竹排定能轉過河灣、繞過障礙、沖過險灘。人是要有股不畏困難，艱苦奮鬥，敢於進取的精神。這樣哪怕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生活中也能找到歡樂和自信，也能有所進步、有所收益、有所作為，一步一步地邁向光明。

我在農村的生活中受到很多的磨練，從一個五穀不分的幼稚的初中生成長為一個合格的農民。1970年春，新選上的生產隊長與兩位副隊長鬧意見，一氣之下宣布辭職不幹了。兩位副隊長不想讓人覺得是他們故意擠走隊長，也不幹了。春耕大忙時節，突然群龍無首，大部分農活都停下來了。那時候是集體所有制，隊裡的生產收成事關全村兩百多人一年的生計。其生產是由隊長組織安排，而隊長則是每年由全村人民民主選舉出來的。那時候當生產隊幹部都是吃力不討好的差事。出工在前，收工殿後。收工後還有許多組織後工作要做。一天下來最多掙十個工分，約合五毛錢。而別的農民可以休息或者在自家自留地裡幹活。他們中的青壯男子一天下來也掙十個工分。所以那時的隊長不像現在那樣會有很多人爭著做。當時的隊長並不是黨團員，被人選上不過是一種榮譽，一種信任，於是就幹了。遇到不滿意的事，真的難怪隊長會撻擔子。可是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村人實在沒有餘地白白地浪費春光，否則他們就要準備明年餓肚子。出於青年人的一腔熱血，我自告奮勇出來代理隊長。那年我才十八歲。盡管我不是黨團員，沒人選過我，也沒有大隊領導的指派，村民們仍然跟著我的招呼出工。如有個別人故意遲到，被我處理，發生爭執，便會有許多村民站在我一邊，為我撐腰。我敢負責，敢管理，但是我的農業生產知識有限，該幹什麼農活，我心中無數。可是我肯學習。頭幾天我是去徵求老農的意見，後來去勸說隊長並徵求他的工作安排意見。從他們那裡出來後，我就知道該叫村民們幹什麼了。幾個星期下來，隊長被我和大隊幹部說服了，重新出來領導。我的代理也就結束了。盡管只是代理了幾個星期隊長，我仍然需要得到村民們的支持。毫無疑問，他們的支持跟我為幾乎每一戶村民都治過病有關。1970年我被推選為增城縣和惠陽專區的知青積極份子代表大會的代表。農村的經歷，使我體驗了另樣的人生，而我受益最深的是我真實感受到學習科學知識的重要性，建立了我自學的信心。

## 部隊

1970年12月，我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當兵是男子漢陽剛之氣的體現，尤其是在解放軍中當兵，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當年，毛澤東主席有一句名言，就是“人民解放軍是一所大學校”。這支隊伍有著優良的傳統，嚴格的紀律，光榮的歷史。我一生都以我曾經作為這個隊伍的一員而自豪。我在南海艦隊某部當工程兵。我們的任務是駕駛推土機、鏟運機、壓路機、挖掘機、等機械修機場，築碼頭，挖地下指揮部。當兵前是農民，肩挑手鋤，當兵後使用這麼多現代化的大機械，對我真是一種強烈的反差。到了連隊的第一個週末我就到縣城書店去買有關機械的技術書。駕駛操作這些工程機械，並不是件輕鬆的工作。長時間的手腳並用，高度的注意力集中，露天的高溫作業，這種工作條件不得不要求兩個人輪流操作一台機械。為了掌握修理技術，當輪到我下來休息時，我總是在看看工地上是否有人在修機械。如有的話，就過去幫忙並學習。弄的一身油一身土是常有的事。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經驗。沒有經歷就沒有體驗。持之以恆地努力取得第一手經驗，當兵一年後我很快就成了連隊的主要技術骨幹之一，比不少當了三、四年的老兵的修理操作技術都好。當兵五年多有三年在施工，兩年在伙房。施工時我一直在工地盡量不停手。

但是解放軍這個大學校並不等於大學。現代化的軍隊需要受過高等教育的軍人。當兵的時候，我又一次感受到科學文化知識對軍隊、對我是多麼重要。當時一半以上的機械都是進口的。有從前蘇聯進口的斯大林牌鏟運機，它們的說明書是用俄語寫的。有從日本進口的推土機和從羅馬尼亞進口的挖掘機。它們的說明書是用英語寫的。當我入伍的時候，這些機械都已經開始變舊了，需要修理。戰友們在修理這些機械遇到困難時，不時會聽到有人說，那些說明書大概會介紹，要是有人能夠看懂那些說明書就好了。

當時好像我們營只有營長才是大學生，但是他或者是沒時間，或者是不懂外文。營裡除了我，沒人能看懂這些說明書。於是我又毛遂自薦，用我在電大學的外語在業餘時間為部隊翻譯這些說明書。一共有五本，兩本俄文的，三本英文的。約有六百頁。我那時外語其實並不好，只是略知一二。我需要英漢字典和俄漢字典。我父親馬上托人把家中的這兩種字典給我送來。我還需要工程技術詞典，我父親是學醫的，不會有這類詞典。當時整個社會都不重視學外語，甚至學外語還會招惹麻煩。很難找到這類詞典。我們部隊當時在湛江。正巧一個廣雅初一丁班的同學凌雲鳳也在湛江（68年我在初二丁班）。經她的引薦，我認識了另一個廣雅的老校友陳惠基。他好像是從清華大學畢業，當時在湛江農機研究所工作。他熱心地從他們所裡的圖書館把我所需要的都找齊了借給我用。萬事開頭難，剛開始的時候，一天只能翻譯幾行。在工具書的幫助下，我慢慢熟悉了語言，翻譯速度加快了。但是以我那時的外語水平，難免會遇到一些攔路虎。有些句子我怎麼也吃不准該怎麼翻譯。我又斗膽向老校友求援。

我和陳惠基約好時間，在一個夏日的夜晚，我把疑難的句子匯總成十來個，帶著書到了他的家。記得那是一個十幾平方米的單間，他一家就住在這個房子裡。因為房子小，當天晚上他的家人都到所裡的院子裡去了。那時沒有空調，我記得好像他家也沒有風扇。不用說還有蚊子。就在這個小小的房間，他用了一個多小時，一一為我解答了所有的難題。清華大學的高材生！他的才華多麼令我羨慕和欽佩。

部隊裡沒人給我分配翻譯的任務。說明書是我從連長和營裡的幹部那兒找來的。翻譯用了一年多，沒有一分錢的稿費，連翻譯用的本子也是用我自己每月七、八塊的津貼買的。陳惠基也是義務幫助我。那個年代提倡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所有的付出，都是甘之如飴，誰好意思要報酬！我當時在炊事班當上士，兼負責炊事班，只有用午休和晚上的時間翻譯。在當時的政治空氣下，學技術學外語往往被人看作真是非常愚蠢的事。不過在我的部隊裡，沒人嘲笑我。因為戰友們都知道我做的事對部隊的工作有貢獻。炊事班的戰友郝樹周主動在後勤部的熟人那兒聯繫好影印我翻譯的說明書，並自告奮勇謄寫。儘管這是無償的勞動，我還是從中獲益良多。它給了我從事翻譯工作的經驗、它給了我學習機械技術的機會、它給了我為達目的而孜孜以求的動力。它不但使我成為營裡最熟練的技工之一、而且又一次使我親身體會到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它又一次激勵了我讀書、求學的欲望、攀登科學文化高峰的信心和勇氣。

一個只讀到初二的人，要想圓自己的大學夢，我要補中學的課程：物理、化學、初等代數、幾何、三角，還有解析幾何。所以，離開中學後，我一直在自學補課。

自學需要課本。在今天中國中小學應試壓力的影響下，各種課本琳琅滿目，書店裡是應有盡有。文化大革命期間，舊的課本不能翻印，新的中學課本又薄得很，還充斥著政治術語，內容貧乏。要想找本像樣的課本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66年到1968年的一段武鬥期間，我住在廣雅中學的圖書館。遍地都是書，大概是破四舊的“戰果”。有一天我看到一本自學課本，它屬於一套數理化自學叢書。我翻了幾頁，立刻被吸引住了。書中內容豐富，解析詳細，作業題分普通題和難題，附有答案。我立刻在書堆裡尋找這套叢書的其它課本。我把書堆都找遍了，找到了這套叢書的大部分。文化大革命期間，圖書館的管理員都被學生們趕回家去了，圖書沒人管，我連手續都不用就把圖書借回家，開始自學。下鄉前，由於我的課本不全，我又向廣雅高中畢業班的同學梁家聲借來缺少的高中課本。他那年去了海南農場。

自學做作業需要桌子。下鄉的時候，派潭山區窮鄉僻壤，書桌是沒的買，只有請人做。可是我們也請不起。在村民的幫助下，我們用村前村後到處都是的竹子作個架子，再用兩塊爛了的禾筒板做桌面，一個桌子就出來了。當兵的時候更簡陋，工程兵住的是自己搭的茅草屋：竹子做支架、茅草蓋屋頂、泥漿稻草糊成牆。為了內務整潔，營房裡不許放其它東西。於是通鋪床就是我的桌子。這對我沒有什麼影響，只要有地方方便寫東西就行了。就這樣我學完了初三到高三的數理化課程。1973年和1974年，我還真有了正而八經的書桌和椅子。那時我負責管理連隊的伙食。書桌是給我放連隊伙食費和帳本的。每天早上五點半，我和戰友們起床做早餐，大約到八點鐘，我們打掃幹淨伙房後，我騎單車去買菜。我常去湛江的自由市場轉，因為那裡的青菜新鮮，且由於我買的量大，價錢也便宜。當然我得向農民討價還價。回來後，我與戰友們一起做午飯。大約到一點鐘，我們會清理完畢，餵完豬，戰友們休息，我就開始幹我的副業。從一點到四點，以及從晚上八點到九點，我會坐在我的書桌前，繼續看書，翻譯。你看那三四本大部頭字典佔多大的地方。要是沒有書桌，那該多不方便！通常在我們營，炊事員是輪流做的。最多一年，他們就會強烈要求回到原來的班裡去。因為戰友們大都是農村兵。他們寧願侍候機械，這樣可以學習技術。退伍後，有技術的人更容易跳出農門，在城裡找到工作。當了上士以後，我真喜歡這書桌和這環境。於是我向連隊領導開玩笑地說，我在伙房很安心，幹到退伍沒問題。其實連隊指戰員都挺喜歡我在伙房工作。自從我到了炊事班後，我買了一本關於做飯的書，學會了幾種新花樣。早餐除了原來的麵條、腸粉和饅頭外，還增加了花卷、棗卷、肉卷、糖包和肉包。這樣一個星期七天都可以有不同品種的早餐。平時我對伙食費精打細算，嚴加管理，盡量防止我自己、炊事員和領導有意無意的揩油。走上一個工作崗位，我總想把本職工作做好。也許是好勝心使然。這樣我在伙房繼續佔用了這張桌子兩年。

1972年左右，毛主席說：“大學還是要辦的。”這個最高指示，像黑夜裡的雷鳴閃電點燃了我上大學的希望。這時候，我已經自學完了高中的數理化。但是，上大學的希望也隨著閃電一樣，來得快，去得也快。與我同年入伍，在一個班的戰友和好友黃建新，被連隊選送到南京工程兵學院學習，而我連被考慮的份都沒有。個中原

因，不僅僅因為他是個好戰士，而且因為他出生在工人的家庭。而我出生在知識分子的家庭，加上有所謂的複雜的社會關係。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學錄取是不用考試的。上級把大學名額分到單位，該單位就通過群眾推薦，領導審查批准，確定人選。人選的文化程度好像不在考慮之列，更不要說實際文化水平的競爭了。如果誰的親戚中有人是“地富反壞右”，那他上大學幾乎是連門兒都沒有。

地主階級是革命的對象之一。解放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地富反壞右”的子女被打入另冊。當時有項政策叫做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有成份論，不惟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它的出發點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定義的很廣。它延伸到可以教育好的孫子，可以教育好的孫女，可以教育好的親戚。一旦誰被冠上這個好聽的稱號，那就意味著這個人從此在入黨、提幹、升學的過程中都要付出比一般人更大的努力。不少領導為了保護自己不被別人批評為階級立場不穩，使得自己在日後的提升競爭中落人口實，寧願不去提拔有所謂的複雜的社會關係的人，或曰可以教育好的孩子們。

我的祖父年僅十二歲即喪父(我的曾祖父享年32歲)。為了生存，祖父年輕時就在老家山區挑貨郎擔，走村串戶賣油鹽醬醋，並靠自學當鄉村郎中。祖母張桃英娘家是貧農。解放前一年，62歲的祖父肝腹水病逝，老家剩下祖母她自己和小姑姑余素文兩個，一老一小，祖母還是小腳女人，她便雇請個農民幫忙。土地改革時祖母被定為富農成份，後來又改定為地主成份。從文革開始，好長一段時間，我被視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唯一例外的是在下鄉的期間。文革頭兩年，我被當眾羞辱，被大字報點名，被七、八個人毆打，主要原因就是我的祖母是地主。時至今日回過頭來看，批判人的人和被批判的人，打人的人和被打的人，都是一場愚昧的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老實說，文革開始的時候，我也積極參加批判會和寫大字報批判我的老師們。直到自己被點名為“白專道路的典型”之前我也是批判別人的人。我在大字報上的觀點，現在看來荒唐可笑、無一正確。但我和我那一代人正值意氣風發，極左思潮的誤導令每個人都摩拳擦掌。從我自己挨批的親身經歷，我體會我自己曾經給老師們施加了多大的精神壓力。我有時慶幸我被打入另冊，否則我也可能會像那些毆打我的人那樣，做出更多傷害無辜的事。

參軍後，我向連隊的領導匯報了我的社會關係，從他們的談話口氣中，我已察覺到入黨提幹的大門對我至少是暫時關閉了。1971年至1975年，歷任領導指導員和連長曾幾次安慰我說，黨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對我是有效的。儘管他們都是出於好意，用心良苦，但是我心裡明白，我被打入另冊了。以前是被群眾組織或個人打入另冊。現在面對的是黨組織。當時我很不服氣，至少這頂帽子是張冠李戴。父親解放前在大學裡讀書時就追隨共產黨幹革命，被地下黨組織批准吸收為共產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愛國民主運動協會”的會員(後轉為共青團員)，是中山大學醫學院組織領導愛國民主學生運動的秘密領導核心成員之一。後來根據地下黨的指示，撤出廣州，轉移到共產黨的游擊隊東江縱隊，參加了解放戰爭。1949年十月奉命作為軍管代表在廣東省中山縣組建人民醫院，並任首任院長。即使在我當兵時父親也還是現役軍人，怎麼我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頂“桂冠”大概就是我不能升高中，又沒資格被選送大學的原因。否則，至少在部隊時，我應有平等的資格被挑選上大學。當兵頭一年，在我未戴這頂“桂冠”前，我被評為營的五好戰士標兵，我們連只有三個被評上，就我一個新兵。

我無意評判這項政策的正確與否。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宣布取消階級以後，這項政策就已經成為歷史。這就是我們的社會，這就是我們的歷史。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中長大的。就算是我認為它不對，不管是說我的“桂冠”戴的不對，還是說這項政策不對，我又能做什麼呢？我只是一個小人物，面對的是一股強大的社會習慣勢力。我只能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對社會有所作為，並為自己創造好一些的、有意義的和快樂的生活。曾經當過農民，生活過在社會的最底層，這經歷使我多了一點坦然的心態去面對生活中波折。儘管當時與戰友們相比我是被打入了另冊，我還是意識到，與農民比，我比他們的大多數的生活和待遇要好多了。農民們一生都在承受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與父母比，我比他們要少挨整。因為外祖父曾在抗日戰爭時期當過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這在70年代以前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中極易成為一些人排除異己的口實。父親在50年代初就這樣被同僚以無中生有的罪名誣陷，使父親受到撤職處分，近30年後才得到平反。母親也因為外祖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群眾“揭發”出莫須有的罪名使母親被關起來，被押在台上受批鬥，直到我下鄉當農民那天都不能見我。半年後母親才被“解放”，即無罪釋放。與祖父比，我比他的生活要平安安定。他們那代人20多年生活在戰亂中，長年擔驚受怕。抗戰時期日本侵略軍曾經把梨溪鄉和祖父慘淡經營的店鋪燒得精光。如今生活了半個世紀，經歷了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我意識到沒有任何一種社會制度會是絕對公平的。每個社會都在試圖保持本社會內各種社會階層利益的某種平衡、大家暫時可以接受的平衡。

我還記得指導員黃培正對我說的另一段話：“小余，你會有一段難走的路。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堅持走下去，大門會為你做開的。”不管我心裡有多不平靜，我知道，自暴自棄是沒有前途的。我別無選擇，只有接受命運對我的挑戰。當我知道我很可能終生沒有機會上正規大學之後，我在1973年做出了一個大膽的計劃：用十年的時間自學完大學的課程。這些年，當赤腳醫生，自學完高中，我對自己的自學能力很有信心。但是我到哪兒去找課本呢？該找什麼課本呢？我真像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向哪兒走。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又一個陌生人向我伸出了熱情的雙手。1973年的一天，我登上來往於麻斜海軍碼頭與湛江霞山之間的交通艇。在艇上與一個陌生人聊天時，知道他是廣雅的老校友陳鳳軍，畢業於哈軍工，當時在湛江的海軍船廠當技術員。我連忙向他請教。他熱情地告訴我應從微積分開始學起，而且慷慨地把他的微積分課本借了給我。那是清華大學的教材。我從此開始了在業餘時間自學大學數學和物理的課程。

自學大學的課程的確不容易。自學微積分好長一段時間了，我都不明白一個變量 $a$ 趨於零的概念。有時候它作為

零處理，有時候它又不作為零處理。我自我解嘲地對自己說，這大概是數學家在玩魔術，什麼時候喜歡它變成零就讓它變成零。我只能盡力而為，充分發揮我的理解能力去啃書。與此同時，我還一直在努力做好本職工作。

文革至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治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個術語是人的政治生命。一個人如果沒有了政治生命，就沒有前途，對於那些有所謂的複雜的社會關係的人以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治生命尤其重要。

1975年是我一生命運的重要轉折。這年初，連長李伙斌告訴我，自1971年起，每年連隊黨組織開組織生活會的時候，戰士們就會為我抱不平。認為即使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已教育好了。連隊領導們也覺得很過意不去。因此，他們決定冒險去為我磕開那扇事關我的政治生命的大門。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大門終於向我敞開了。鑒於幾年來擔任副班長、班長和上士期間所表現的工作能力，鑒於我的外語能力對連隊的貢獻，鑒於我的機械技術水平，經連隊指戰員的極力推薦並得到營首長的首肯，連長張桂龍徵求我的意見，問我是否願意被提拔為排長或事務長，並由我選擇。排長以上的幹部是軍官，解放軍軍官在那時候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提幹後工資就比工人多四分之一。我當時真是受寵若驚，怎會說不願意。我選擇當排長。這時毛主席說過的話還真在我耳邊響起：“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我們應當相信群眾...”。如今毛主席已經走下神壇。但是，他的這些話仍然是至理名言。古語就說“民心是杆公平的秤”。

1975年中，連裡讓我辦理提幹的手續，填表，體檢，然後一級一級地送審。在提幹審查期間，1975年底，我作為代理排長，外出接新兵。通常接兵的人就是帶兵的人。接完新兵就在新兵連訓練新兵。訓練完成回連隊，退伍老兵已經離開部隊了。但是天有不測風雲，就在我的提幹手續快完成之前，在一次純屬偶然的情況下，我加入了於亦武等另外三個戰友的行列，就不正之風現像向一個上級首長提意見。首長接受了我們的批評。但此事卻不可避免地冒犯了領導，於是提幹擱淺。1976年初我接兵歸來，得知我在退伍名單上，而不是接著訓練新兵。那年新兵連接兵的人中唯有我一人在退伍名單上。如果不是這次偶然事件，我的後半生的人生軌跡恐怕就不是現在這樣的了。是福是禍，只有天曉得。儘管提幹一事無疾而終，它標誌著我的能力終於被主流社會認可，標誌著我擁有提幹和升學方面的平等權利。儘管它姍姍來遲，我仍然從心裡感激老連隊的指戰員，我的好戰友們。是他們為我摘掉了那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使我從此輕裝前進。他們給了我的人生道路上繼續努力拼搏，建功立業的信心和力量。

## 工廠

1976年三月，我退伍來到廣東省拖拉機廠裝配車間190試車班當鉗工，兩個星期後我被任命為這個有45個工人的班組的組長。自1972年起，上正規大學的心一直沒死。那時規定大學生必須是25歲以下。退伍那一年，我正好25歲。我三月份進廠，最遲七月份就要開始錄取大學新生。我知道下車伊始，工人群眾和領導對我不熟悉，當年被選送大學是沒戲了。次年我剛好超齡。我當時覺得命運好像在捉弄我。先是沒有平等的升學權利；等我好不容易爭取到了這份權利，我又沒有了升學資格。我當時不由想起諸葛亮在五丈原臨終前無可奈何的感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想我此生是沒有機會上大學，唯有背水一戰，走自學成材的道路了。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進廠後不久，我突然高興地發現，廠裡辦有721工人大學。工大的時代背景是，1971年後毛主席大概看到關閉大學帶來的問題，改變了政策，大學重新招生。同時在他的支持下，不少大型工廠紛紛開辦大專性質的學校，當時叫做工人大學，以適應工廠對科技人員的需求。廠裡的工大，學生年齡沒有限制，帶薪脫產讀三年，畢業後國家承認其大專學歷。1976年底，廠工大要招一批新生。招生的程序是有三年以上工齡的工人先報名，再筆試數學，然後由班組工人推薦，爾後車間領導根據廠分配的名額挑選，報送工大。工大原則上按照車間的意見錄取。

這一回是真有希望了！我趕快報了名。筆試是在冬天，可我覺得春天來了。我相信，按常規我應該被錄取。明擺著的：第一，我的筆試成績名列前茅。第二，我任班組長後，我的班組當年就從一個被車間認為頭痛且遲到早退現像嚴重的班組變成為廣州市“工業學大慶”先進班組。我的車間只有我這個班組被評上，而我的班組是全車間八個班組中兩個最大的班組之一，且全廠只有四個班組被評上。第三，我被評為廣州市機電系統的先進生產者。全廠有十幾個被評上，而我的車間就我一個。所以無論從紅還是從專的角度選擇，我都勝券在握。

然而，現實並不按常理出牌。經我向車間黨支部書記試探後，我發現事情糟了。車間主任和書記都不支持我讀工大。理由很簡單：工作需要。我急忙殺了個回馬槍：廠裡給了我們車間三個名額。車間兩百多人中，我們試車班就有45人。所以我們試車班人至少應有一個名額。

結果三個青年工人被車間選送工大。他們是吳兆全、芮荊萼和張韜光。兩男一女，都是班組長，都是好樣的，沒有一個是車間領導的親戚。為了封住我的嘴，車間領導有意挑選了芮荊萼，他是我們班組的副班長。這一招很厲害。有多少理由我都拿不出來。因為這三個人都是我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我們在工作中很配合。

我當然知道，車間領導不是不喜歡我而有意跟我作對，反而是太喜歡我而不願意讓我離開。車間領導如果不是很贊賞我的工作，如果不在全廠幹部會議上做很大的努力去力爭，去做說明，那就不太可能的把我和我的班組從全廠七、八個車間，幾十個班組，兩千多工人中選為先進。他們也不是不為我的前途著想。勞書記和嚴主任都是工人出身的幹部，沒有讀大學，照樣領導從南京工學院畢業了七、八年的薛祖華技術員。那時候，文革的思潮仍然佔主導地位。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不受重用，反而被嘲笑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沒有用的臭老九。工人階級才是領導階級。工人出身的勞書記和主任認為我已經是工人班組長，上大學沒有必要。車間領導很器重我，有意培養我接班。當然本位主義也是他們的考慮因素。

無論是從他們樸實善良的本意考慮，或者是從今後工作關係考慮，還是從實際效果考慮，我都不想與車間領導鬧僵了。但是我也不能讓我期盼了十幾年的機會這麼輕易地在我手中滑掉。我先找工大校長李壽允和黨支部書記梁鳳燕陳述我的情況和願望。素昧平生的他們一口應允：只要車間同意，工大專門為我增加一個名額。我回去找勞書記商量，他一口回絕：不行。這個回答我有思想準備。我沒生氣，又探討妥協的方案：頭一年不脫產，第二年半脫產，第三年全脫產。我向勞書記保證：頭兩年我一定確保我的班組照樣順利完成生產任務。這應是個書記無法拒絕的方案。果然勞書記鬆了口，說他支持這個方案。我又去找工大領導，他們非常通融。決定先以旁聽生的身份錄取我，頭兩年我不必聽課，考試另行為我安排，等到第三年才轉為正式的工大學生。我可以先住進工大學生宿舍。

可謂絞盡腦汁，也算“如願以償”。我終於同時與吳兆全、張韜光和芮荊萼他們三個正式生一起高高興興地搬進工大的宿舍。宿舍在廠辦公樓對面一棟的頂樓。一共有47個正式生。我算半個。都是年輕人。男生略比女生多些。只有一個班。唯一的教室也在同一棟樓。這是我第二次上大學，第二次以旁聽生的資格上大學。

我對我的計劃充滿信心。此時我已經自學完了微積分、普通物理學和材料力學。更不要說英語課。這在正規大學要用一年的時間。所以第一年應會輕鬆過關。第二年會稍緊點。但是上課時間我可自由選擇，反正書記已經同意我半脫產，沒有誰會管我這個組長。咬牙頂一頂，一定能熬過去的。第三年就是全脫產了。當然我對頭兩年完成生產任務的保證是毫不含糊的。讀大學不是我的目的，只是為我建功立業奠定所需要的知識和本領。我當時想，讀完工大，我還可能要回車間工作的，我必須給自己留一片天空，以便未來大展拳腳。

盡管我相信我比同學們超前一年，但是不敢掉以輕心。在同學們的幫助下，我密切注意上課的進度，溫習有關內容。如果碰上夜班，白天就去上課。了不起就少睡點。當兵的時候，就試過連續一個月一天工作16個小時。工大考試，我都是單獨考的，因為班裡的考試往往是在我上班的時候進行。我考試時，老師把試題給我，讓我一個人自己到課室裡去做。做完了交回給老師。有一次，我除了一道題外全都做出來了。被卡住的一道題是求反餘弦函數的導數，我怎麼也想起那個應記住的公式。一個同學正在打掃衛生，看見我被卡住了，笑著給了我提示。工大的學生都對我這半個同學寄以同情。那時對考試也不是很嚴格。文革中批判考試是資產階級的管卡壓，73年又批判考試是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回潮。但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考試作弊，不管怎麼說都是辜負了老師對我的信任。我因此領會了一種心態，就是如果缺乏監督，又有易得的機會，考試作弊就會在自覺與不自覺中發生。在我以後的執教生涯中，我都頒布嚴格的考試紀律，並且認真地監督執行。我從自身的經驗知道，百密才能防一疏、嚴師才能出高徒、嚴格的監督制度才能教人學好。

1976年毛主席逝世。經過一番政治鬥爭，鄧小平同志帶領中國人民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由鄧小平拍板，1977年起恢復高考招生制度。此決定於10月21日由中央台播出。因為準備時間不充分，當年的高考在1977年12月10日前後舉行。招生年齡放寬至31歲。在校的大學生大專生包括工大的正式學生不能報考。

文革期間大學招生廢除考試篩選，至少在當時是個失敗的試驗。試想一個班的學生，水平參差不齊，小學程度的學生與高中程度的學生混雜在一起，老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如果遷就小學程度的學生，大學就變成中學。如果遷就高中程度的學生，那另一部分學生就跟不上。即便將來大學教育普及了，招生仍然會要考試，以利於因人施教。目前美國大學教育已經普及。例如紐約州立大學便有64間分校，41萬在校大學生。美國80%的青年高中畢業，40%的青年讀過大學，20%的青年大學畢業。美國基本上可以做到誰想上大學就可以到一間公立大學入學。但是原則上不是學生挑大學，而是大學挑學生。除非進本地的社區大學，否則，一律要考試。進了大學，往往還要通過預考確定學生的程度，不行的給他們開個班，補中學的課。

高考新聞傳來，我高興得差點暈過去了！我上工大的一波三折真是應了那句典故：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要是車間領導當初開恩，讓我順利脫產讀書，而不是讓我帶個旁聽生的尾巴，我就沒有這次機會了！畢竟本科四年跟大專三年是有很大差別的。記得後在中山大學，一個76屆的高材生對我說，如果可能，他寧願留級到77屆。理由很簡單：1971-1976年期間，大學都是三年制。

新的招生政策規定每個申請報考的人要經過單位的批准。年齡要在25歲以下，但是有特殊專長的可以放寬到31

歲。什麼叫做特殊專長？每個人都可能有他自己的解釋。這個模稜兩可的規定幾乎又要了我的命。我報了名，並在報名表上申明我有兩門外語的專長，曾翻譯了兩種外語共七本工程機械和汽車的說明書（在部隊翻譯了五本，在工廠翻譯了兩本）。到了車間審查時，書記以我超齡為理由沒把我的名字報上去。這次他還不告訴我。車間副主任鐘仕標讀過中山大學，知道大學教育的作用，覺得這樣對我實在太不公平。他無法說服書記，便仗義執言向廠革委會主任兼黨委書記杜化山反映情況。杜書記是個老革命。據說，他在那個關鍵星期的每週全廠幹部會議上說：“裝配車間有個青工，懂兩國英語（杜書記不知道英語和外語的區別）。他想考大學。但是車間領導不給他報名。這不好嘛。我們廠不僅要出產品，也要出人才。”老頭子的話說得多好！那個星期六是報名截止日期。沒有鐘主任和杜書記，我差一點報不上名。

故事到此，似乎該結束了。但是我又應了另一句俗話：好事多磨。1977年秋，我參加高考，得了265分。滿分是400分，其中語文、政治、數學三科各100，物理、化學各50。我的分數高於普通院校錄取分數線的250分，但是低於重點院校錄取分數線的280分。因超齡且成績不突出，我1977年的高考最終落榜了。同一班組的工人王哲考上了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同一車間的張小平考上了北京工藝美術學院。我的失利在於兩處：第一，語文和政治沒有復習好，總共才剛過100分。不過它們歷來不是我的強項。第二，我被數理化考卷中的附加題誤導了。這些附加題須要大學數學和物理的知識才能解。我當時誤認為，自己是超齡的，只有把這些附加題做完，顯示出我的水平，才有可能勝出。等我用微積分和高等代數的知識做完了數學和物理的附加題，已經沒時間去檢查必做題。結果數學才得了70多分。理化倒是還好。後來才知道，附加題的分數不進總分。錄取時如果總分不上線，不看附加題的分數。1977年的高考打了大家一個措手不及。考生水平普遍很低。一個當年參加高考改卷的老師告訴我，很多考卷都是零分。只要必做題做好了，就能上線。如果我放棄數學的附加題，騰出時間去檢查對我來說不是太難的必做題，拿多20分應該沒問題。歷史沒有如果。我唯有接受刻骨銘心的教訓和沉重的打擊。

1977年，一千多萬人報名參加高考，但是只有五百七十萬參加了考試。近一半人不敢參加考試。文革期間的中學教育，基本上是放任自流。有點像美國現在的中學教育。其結果也像現在的美國中學畢業生的水平。高中畢業生的數學普遍只有最多當今中國初二的水平。以這樣的程度當然沒信心參加高考。77年最終有27.3萬人被錄取上大學。由於高考推遲了，新生是在78年2月入學。我的夫人葉玲就在那年考進中大物理系。不過那時我們還不認識。她也當過知青。她告訴我她77年高考的分數剛過280。77屆的這批大學生，大多數都天賦很高。夫人後來在紐約市立大學獲得物理博士學位。做博士後時，把一個三十年前獲諾貝爾獎的叫做localization的理論第一次在實驗中証實出來。她告訴我她為了安裝這項實驗的裝置，像當年當知青時一樣趴在地上擰螺絲，調試位置。這項成果馬上為人們認可。她曾經應邀在美國物理年會上作了一小時的關於這項實驗的特邀報告。她現在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任教。我們是在1983年聖誕節在美國紐約市結婚的。洞房是個不到16平方米的閣樓，近一半地方要彎著腰。我當時32歲。我們知青這一代，大多結婚很晚。我不過是比他們的大多數再晚了一點。結婚的時候，沒有白色婚紗，也沒有進教堂。我們在中國領事館辦理了結婚証。領事說，我們是建國以來第一對在中國駐外使、領館辦理結婚証的留學生。我們請三個同學在一個小餐館吃頓飯，算是婚禮。那天晚上，我們在世界貿易中心大廈裡和在洛克菲勒中心前的聖誕樹下留下了美麗的回憶。當時五個留學生中四個是知青出身，另外一個上大學前是工人。我們知青那一代人的婚禮恐怕沒有哪一場可以與我們的婚禮相媲美，沒有哪一場比我們的婚禮更豪華。在遠隔重洋的世界金融中心紐約市曼哈頓舉辦婚禮？過去我們想都不敢想。

1978年，高考政策沒有變。我一方面認真復習備考，另一方面溫習工大的功課以防掉隊，同時盡力做好我的本職工作。有了77年高考失利的教訓，我知道我有再次失利的可能。我不能破釜沉舟，必須做好兩手準備，進可攻：入大學深造，退可守：留工大畢業。根據當時的國家政策規定，大學畢業生社來社去、廠來廠去。我準備了畢業後回廠續創創業，因此我不希望給人留下虎頭蛇尾的印象。

1978年的7月20日，我又參加了高考。每科我都有時間檢查。考試中，我沉住氣，盡量小心地核對作過的步驟。英語考試是在7月22日下午。我記得英語考試開始15分鐘內，滿滿一課室的考生走了一半。半個小時後，課室裡只剩下兩三個人。一小時後，我是唯一剩下的。我看了看監考老師，她笑著說：“沒關係，安心做。”英語考試兩小時，我花了一個半小時做完，然後用剩下的時間檢查。時間到了才交卷。那年理科考生英語考試不進總分。那兩年大學開學後，大多數同學英語要從ABC學起。因此一年後，我在中山大學的全校英語比賽中輕而易舉地戰勝76、77屆的高年級同學，獲得理科全校第一名。

這年考了政治、數學、語文、英語、物理、化學。每科滿分100分。我這六科分別得50、76、78、81.5、83、88。不算英語，總分375。當年重點院校的最低錄取分數線是340。外語學院和重點大學英語專業的英語單科分數線是70。有人告訴我，我的分數在廣東進入了前800名。這時我知道這回上大學是板上釘釘子，沒跑的了。有趣的是，這次我的弱項語文卻比我的強項數學考的高。考的最好的是化學，而我卻從未見過一次化學實驗。

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得知分數的情景。本來是在各單位張榜公布上線考生的分數。因為我的徒弟的哥哥在區招生辦工作，他把我的分數記下來，提前一個晚上告訴我。那天下班後，我騎單車到他家。他把分數一一告訴我，並說：“恭喜你，你考得很好。”那時大概是晚上七點左右。天黑了，但是我覺得周圍的一切都變得光明起來。離家有七公里，在騎車回家的路上，我禁不住哼起歌來。回到家，父母急忙問：“怎麼樣？”“不太好，政治才考

了50分”，我想逗逗他們。不過我無法忍住自己的喜悅，還是馬上把喜訊傳給他們。可憐天下父母心。

## 大學

不久我收到省招生辦發的那份彌足珍貴、保存至今的錄取通知書。

高等學校

編號7800441

學生入學通知書

廣東拖拉機廠轉余岐青同志：

經省招委批准你入中山大學數學力學系自動控制(專業)走讀學習。

報到時間於1978年10月5日至10月7日止，請憑本通知到校報到。

中山大學

1978年9月21日

我終於被中山大學錄取。父親從這兒畢業，我的中學同班同學葉抗衛和丘辛敦、還有我們營的戰友張安茜、以及我們車間的副主任鐘仕標也都曾是這兒的學生。我曾多少次繞進這個稱為康樂園的校園，在綠瓦紅牆的教學樓邊和濃蔭蔽日的竹林中穿過，留下羨慕的眼光。

省拖拉機廠大門正對著中大西門，中間只隔著新港路。這是多麼戲劇性的巧合，我從此處走完了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從新港開始人生新航程。1978年10月7日，我特意像往常一樣一早騎單車回廠，不過這天是去辦理離廠手續。然後離開省拖，推單車橫穿過新港路，走進中大西門去報到。我一生第三次成為大學生，坐在大學的課室裡。不同的是，我這次是正規大學的正式學生。從1968年10月離開廣雅中學到1978年10月走進中山大學，整整十年過去了。我終於如願以償圓了16年前的大學夢！這時我又想起了那句古話：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個天就是鄧小平。是他給了我這次機會。

據說，1978年有六百多萬人參加高考，40.1萬人被錄取。這是文革後第一次擴招。我們馬二村四人知青集體戶的梁家姐弟那年也上學了。我們裝配車間的另一個班長廖加寧進了華南工學院。我們營的戰友鄭維先考上暨南大學。因為擴招，校舍緊張，我剛開始時是走讀生。我們班年齡最大的是廣雅中學的同學張培堅，31歲。我們系年齡最小的是莫末秀，15歲。我27歲。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年政策有點改動，招生年齡絕對上限變成27歲。我那年正好28歲，多慫啊！

進了中大，圓了大學夢。但是我記得我還有一個童年的夢：當科學家的夢。這個夢還沒圓。我決心挽回失去的時間，跳級回到77屆。我應該屬於77屆。當然付諸現實並非容易。首先，跳級要求每科成績75分以上。另外，雖然我自學了相當於一年半的大學工科課程，但是我現在是在學理科。學過的課程有些相似，但不雷同。我學過的微積分和線性代數，它們偏重公式的運用。要學的課程中與之對應的是數學分析和高等代數。這兩門課則偏重理論推導。有些學過的課則沒有我們對應的課，像材料力學、機械原理、機械制圖、金屬工藝學等。只有英語和普通物理學跟我學過的是一樣的。不管怎麼說我還是比同班同學先行了一步。我在學好本年級的功課的同時，一門一門的趕77屆的功課。一個假期趕一門。然後跟77屆的同學一起考那門課。因為77屆跟78屆只相差半年，終於讓我趕上了。82年二月我與77屆的學生一起從中大畢業，並取得學士學位。

在大學期間，我被評為中大的三好優秀生和優秀學生幹部，還被評為廣東省的高校三好學生。我們那一代人深受雷峰叔叔的影響。雷峰叔叔幹一行、愛一行，幹一行、專一行的敬業精神一直激勵著我。下鄉時我曾爭取做個好農民；參軍後我在努力當個好戰士；進了廠我一直是個好工人。在工業、農業和國防戰線獲得的一個個榮譽稱號是社會對我所做的努力的証書。工作是生活的保障。最理想的是愛一行才幹一行。在現實中，對許多人來說還不可能有這種理想的選擇。但是工作已是人生的一大部分，如果不能學會熱愛工作，人生的一大部分時間就會感覺枯燥乏味。熱愛工作其實也是熱愛生命、熱愛生活。我覺得當你熱愛工作的時候，生活也會厚待你，給你歡樂和幸福。但是這一次當個好學生卻不同以往。我是愛這行(上大學)才爭取幹這行。豈只是愛？這是我十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蒼天厚愛，賜我機會上大學，我怎會不珍惜？我當然會全力以赴地讀書，並做好力所能及的社會工作。

大學畢業後，憑著外語的優勢，我接著出國留學。1983年12月我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簡稱UCLA)獲取碩士學位。1986年五月又在同一學校獲取博士學位。

我們祖孫四代知識分子的求學之路從一個側面見證中國教育跨越三個世紀的發展。曾祖父是名符其實的秀才，不過那時大學還沒傳入中國。祖父年輕時大學剛在中國開辦。那時他家境貧寒連學校都沒上，更何況上大學？只好在老家山區靠自學當上鄉村郎中。父親年輕時在戰亂中步行幾百公里走出山溝上大學。我年輕時在爭取上大學之路上走了十年，最終上了大學，並乘改革開放的春風飛越大洋走出國門讀博士。現在步入初步小康社會的中國每年被錄取的大學生數量已經是我們當年的十倍，比起我的父輩、祖輩那時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出國留學也不那麼稀罕。

我不會忘記，是中國的父老鄉親把我培育成大學生。1997年後，我終於有幸作為母校中山大學的客座副教授、客座教授，幾乎每年在少年時代流連忘返的康樂園內，義務為沐浴著時代春風的新一代大學生和研究生用雙語講授一門門的專業課，回報中國的父老鄉親。

可以這麼說，大學畢業才標誌著我真正圓了大學夢。走進UCLA則是圓科學家夢的開始。在UCLA研究生院的數學系，我結識了很多新同學，看到天外有天。幾乎每個人都有一段精彩故事。與我同年進UCLA的舒其望現在是布朗(Brown)大學應用數學系的主任，比我晚一年的侯宜釗現在是加州理工學院(CIT)的教授，比我晚兩年的萼維南現在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這三位現在都可稱為很有建樹的國際知名教授。比我早一年的譚琳現在是賓州一所大學的教授。他1977年進浙江大學，接著跳上研究生院，隨後成為77年後頭一批出國的研究生。比我晚一年的王詩晟現在是北京大學的教授、科學院院士。他77年高考是江蘇鹽城專區第一，因為他父親是海龜學者，“自然而然地”有裡通外國的嫌疑，還是由於落實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他總算進了鹽城師專。一年後他考上北大研究生。1987年在UCLA獲博士學位。1989年秋天在美國柏克利(Berkeley)大學做完博士後，義無反顧地重回北大教書。與我同年進UCLA的王駒現在是中科院的教授。77年未參加高考，卻在1978年考上了中科院的研究生。接著成為77年後頭一批出國的研究生。最後提到的這兩位都跟我一樣，只讀了初中就在1968年下鄉了。王詩晟在農村一直待到上大學，王駒後來回城被分去商店賣鹹魚。

就是在讀研究生的時候，我開始明白科學研究是怎麼回事，科學家是什麼意思。1984年在我導師弗格森(T.S. Ferguson)教授的指導下，我開始接觸兩個統計學決策論方面的課題。一個課題是關於經驗分布函數是否有一種叫做可許性的最優性。第二個課題是關於經驗分布函數是否有另一種叫做最小最大性的最優性。兩個課題都起源於50年代。第一個問題長期以來被好幾個柏克利(Berkeley)大學，普度(Purdue)大學和康乃爾(Cornell)大學及其它名校的教授試圖正面攻擊未成功，於是這些教授退而求其次，發表了側面攻擊這個問題的文章(見附錄[1])。這一來，它就成為了出名的難題。第二個問題也被幾個大統計學家討論過，形成共識，但無法証實。故稱為猜想。這一猜想後來(1967)被放到經典的教科書裡(見附錄[2])，成為統計決策論方面的著名猜想。

這兩個問題都與經驗分布函數有關。經驗分布函數有很多應用。比方說，我們想知道癌症病人活不到1年的百分比、活不到2年的百分比、活不到3年的百分比、...、活不到10年的百分比。這些百分比要想得到準確數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估計。最方便的方法是用已知癌症病人中活不到1年的百分比、活不到2年的百分比、活不到3年的百分比、...、活不到10年的百分比來作估計。這些百分比就是在運用經驗分布函數。經驗分布函數是對未知百分比的估計。統計學還有其它的估計。於是就要比較哪種估計方法好，或者說比較哪種估計有最優性。可許性和最小最大性就是兩種不同的最優性。

1986年在我的博士論文裡，我把第一個著名的難題完整的解決了。我証明了如下結論：如果只有一個或兩個數據則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有多於兩個數據則答案是否定的。我找到了一個更好的估計。這個結果1989年由我單獨署名發表在第一流的統計雜誌上(見附錄[1])。能把這麼一個存在三十多年，多位大師未能解決的難題攻克，除了歸功導師弗格森教授的指導，我還要歸功於中大的老師在數學分析和高等代數給我打下的扎實的基礎。自學畢竟比不上有人指導，錯了自己都不知道。

1987年我和另一個在波士頓的東北大學的同事周沫素(Mosuk Chow)合作，成功地解決了上述第二個問題。就是說，我們成功地証明了那個存在了近四十年的著名猜想。這個結果1991年發表在同一個統計雜誌上(見附錄[3])。

這兩項結果都是科學研究的結果。科學研究就是在你所工作的學科中不斷找出問題，解決問題，更全面更準確地認識客觀世界。可以這麼說，數學或統計學中的著名難題和猜想就像埋藏起來的明珠，一旦發掘出來，你的學術成就馬上為人們認可。因為它經過了時間的考驗。能夠發掘出來這樣的明珠，真是一種運氣。另一方面，我想強調這個結果充其量只是無數明珠中的一粒。如今的科研領域中，很少有什麼結果會有所謂轟動效應。我做的這些結果也沒有什麼轟動效應。我之所以成功，也是在前人的一步步結果的啟示下做出來的。絲毫不說明我比前人更高明。一個人的成功是天賦、努力和機遇三者的結合。也許還要加上一條：別人的幫助。至少對我是這樣。我由衷地感謝在那十年爭取上大學之路上給我雪中送炭的朋友：梁家聲、凌雲鳳、陳惠基、陳鳳軍、鐘仕標和李壽允，當然還有我的父親。

中國歷史上不少大詩人在許多風景名勝的牆上留下引人入勝的詩詞。於是不少遊人也在仿效，眾多旅遊景點的樹上和牆上，到處可見xxx到此一遊的塗鴉。我建議有抱負的青年人爭取到科學聖殿的牆上刻上xxx到此一游。要記住，步入這個殿堂，在聖殿的牆上留名，是要經過批准的。你的科學論文就是這個聖殿的入場卷。每當你有重大的結果，而且被審查通過了，你的名字就被刻在聖殿的幾堵牆上。其中一堵牆就叫做世界科學文獻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我到過不少旅遊景點，從來沒有塗過鴉。但是我可以很自豪地說，我和夫人曾經在科學聖殿的這堵牆上刻上幾個字：余岐青、葉玲多次到此一遊。

自從我圓了兒時的大學夢後，我一直在努力圓科學家的夢。86年以來，每年科研都有若幹斬獲。親手培養的博士一一走上了教學科研崗位。我曾經收到美國拉特格斯(Rutgers)大學、普度大學、伊州大學芝加哥分校和肯特基大學勒星頓(Lexington)分校等在美大學排名前五十的學校的任教聘請，先後在美國東北大學(在美大學排名前六十)、紐約州立大學石溪(Stony Brook)分校(在美大學排名前二十)和賓罕頓(Binghamton)分校(在美大學排名前八十)等著名學府任教。曾應邀到童年夢中的高等學府莫斯科大學講學。先後五次爭取到成為美國自然科學基金會等資助的國家級科研課題的負責人。沿途登上了助理教授、終身副教授和終身教授的台階。在這個過程中，我接觸了許多同行，慢慢領會了科學家的真實含義。科學家對他們所從事的學科有深刻的理解和淵博的知識。他們有驚人的記憶力和過人的邏輯推導能力。就像錢學森和我導師弗格森教授那樣。我不具備這種天賦和能力。這種天賦不是努力可以改變的，也不是時間可以改變的。即便時光倒流，文革未發生，我年輕八歲上大學，我也成不了科學家。但是我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圓夢。我在圓夢的過程中找到了答案。我知道了什麼夢可以圓，什麼夢是不現實的。我這一生不會因此而後悔。我在圓夢的過程中實現了我可能實現的目標：我成為了一個小有建樹的科研工作者，英文scientist的同義詞。

## 尾聲

常言道，人生五味。其實日常生活中，酸、辣、苦的時候比甜的時候多。就算你真的是在過著許多人看來是一直幸福的日子，身在其中也不覺得甜。因為你已經習慣了。頂多就覺得是平常的鹹味，離不開，但是沒有什麼驚喜的感覺。而現實是總有比你的條件好，比你的某方面強的人。與他們相比，你常常會有一種酸酸的感覺。如果生活中有一種東西，你非常想得到又長期沒有得到的時候，你會強烈地感到生活的無奈和苦悶。生活充滿了難以預料的事件和各種變數。難免暫時會有困難、挫折、失望和不幸的遭遇。如果在戀愛、婚姻、求學、升遷、事業方面遭到挫折和打擊，那自然是一種熱辣辣的滋味。對這些酸、辣、苦，如有健康的態度，對你的消極影響就不那麼嚴重了。

人活著，應有一種健康的心態。寄希望於未來，有遠大的理想，並為實現這些希望和理想腳踏實地地努力奮鬥。如果有了這種心態，哪怕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到歡樂和幸福。

在我十年工農兵的經歷中，多少次壞事甚至會轉化成了好事。我覺得我這一生是很幸運的，因為我在經歷了知青一代人所走過的艱難曲折後實現了為人民也為自己建功立業的理想；同時又因為我能有機會到基層乃至社會的最底層去生活，去親身體驗世態炎涼，去親口品嚐人生五味。就像掉進了苦海，沒被淹死，反倒學會了游泳，游回岸邊。還有了一次歷險的精彩經歷和一種在大學得不到的精神財富。可不，因為當過工人，我自然而然地有了修車的本領，在我到美國前十年經濟不是太寬裕的時候，使我減少許多麻煩，尤其是在經濟上；因為當過炊事兵，做飯成了一种喜好和娛樂，自然有了舉手之勞就可得到的口福；因為當過農民，現在在自家院子裡和夫人在一起栽花種菜，得心應手，其樂融融；因為當過兵，我練就了堅強的意志和健壯的體魄，天暖時爬山、游泳，天冷時在後院的山坡上滑雪。十年工農兵的閱歷使我在隨後攀登科學高峰的過程中有一種在遊山玩水中奮力拚搏的心態。無論有多少困難和挫折，那都是我喜愛的又能讓我經濟寬裕的事業。回首往事，我由衷地覺得生活是豐富多彩，非常美麗的。其美麗就在於人生有酸甜苦辣。人生的酸甜苦辣每一味中都可能找到生活的樂趣。十年工農兵的生涯中，我大多數時候是快活和樂觀的，因為在世態炎涼中，我體驗到人間的真情：農民的關心，戰友的鼓勵，工人的支持，友人的幫助，領導的鍾愛；因為在與命運的抗爭中，我在一步一步地向走上走。

兩個童年的夢。大學夢圓了。科學家的夢我知道圓不了。但是在圓夢的過程中我就像穿上了電影“紅綾艷”中的紅舞鞋，在科研的舞台上跳上了癡。我對未來又有了一個可能實現的夢：在未來二十年繼續有機會反覆走進科學的聖殿。那是一個美麗神聖的地方。值得我一再回訪。

附錄:

- [1] Yu, Qiqing. (1989). Inadmissibility of the empirical distribution function in continuous invariant problems. *Annals of Statistics*. 17, 1347-1359.
- [2] Ferguson, T. S. (1967).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 Decision Theoretic Approach*. Academic, New York. 197.
- [3] Yu, Qiqing and Chow, Mosuk. (1991). Minimality of the empirical distribution function in invariant estimation. *Annals of Statistics*. 19, 935-951.